原住民作家與「台灣島史」書寫: 以巴代的《暗礁》、《浪濤》、《月津》為例ⁱ

許明智ii

摘要

將自己定位為「族群文史工作者」的卑南族作家巴代,近年的創作卻不再將視 角侷限於出身地「大巴六九部落」與身分別「卑南族」,更擴及排灣族、西拉雅族 與漢人等不同族群的歷史。然而,當前有關巴代的論文,多探討其如何以書寫重構 自我族群的歷史,本文則以曹永和的「台灣島史」觀為研究框架,關注巴代如何於 《暗礁》(2015)、《浪濤》(2017)、《月津》(2019)中書寫「卑南族之外」的歷史, 且經由「海洋相關意象」所寄寓的歷史觀。本文指出,巴代藉由「暗礁」與「浪濤」 的意象交織出「多重因果敘事」,體現歷史如何形構於結構與個人的互動;而圍繞 於「月津港」的「溪、港、夕陽、霧」,則被巴代作為重構在地商業史與個人情慾 史的元素,呈顯出小人物於大歷史結構中的能動性,上述作品皆能反映巴代以海洋 史觀的建構,來銜接「台灣島史」論述的書寫實踐。

關鍵詞:巴代、歷史小說、台灣島史、原住民族文學、海洋史觀

來稿日期:2023.03.28,通過刊登:2023.09

i 本文初稿感謝孫大川老師的指點,其後的改寫與修訂則感謝三位審查委員的細心建議,筆者已盡力修正,若有疏漏之處,文責由筆者自負。

ii 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

Aboriginal Writers and the History of Taiwan Island: Using Badai's "Reefs", "Waves" and "Moon Port" as Examples

Hsu, Ming-Chih*

Absract

Aboriginal writer Badai, who positions himself as a "worker of ethnic culture and history," has expanded his works beyond his hometown, the "Damalagaw Tribe," and his identity as a "Puyuma." In recent years, he has delved into the historie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the Paiwan, Siraya, and Han Chinese. However, most current research on Badai focuses on how he reconstructs the history of his own ethnic group through his writing. This article, using Ts'ao Yung-ho's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Taiwan Island" as a research framework, examines how Badai writes the history beyond the "Paiwan" in his works "Reefs" (2015), "Waves" (2017), and "Moon Port" (2019). It also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veyed through the "ocean-related imagery."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Badai uses the imagery of "reefs" and "waves" to create a "multi-causal narrative," illustrating how history i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s. And the elements surrounding "Moon Port," such as "streams, ports, sunsets, and mist," are used by Badai to reconstruct elements of local commercial history and personal history, highlighting the agency of ordinary peopl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All of these works reflect Badai's construction of a marritime

^{*}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necting to the discourse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 Island."

Keywords: Badai, historical novel, History of Taiwan Island, indigenous literature, mariti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一、前言

在臺灣島的基本空間單位上,以島上人群作為研究主體,縱觀長時間以來臺灣透過海洋與外界建立的各種關係,及臺灣在不同時間段落的世界潮流、國際情勢內的位置與角色,才能一窺臺灣歷史的真面目。1

上段引文出自 1990 年,台灣史研究先驅曹永和的〈台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台灣島史」概念〉一文。曹永和於此文提倡,台灣史研究應以台灣島的人民為主體,並將「海洋」視作台灣島與世界連結的媒介,試圖在主流的漢人移民開拓史研究外,開拓出另一條研究路徑,深具海洋史觀的思維。而後,周婉窈於 2011 年的演講中,深化「台灣島史」的內涵,揭示研究者應關注「山、海、平原」的三大元素——「平原」對應的是既有的漢人開發史研究,「海」則是海洋史研究,而「山」所對應的是以原住民史研究為主。不過,周婉窈卻也於演講中指出,當時關於原住民史的研究,是台灣史學界研究者較少關注的部分。2

在學界的論述與研究之外,本文認為,原住民族對於自己族群歷史的書寫,或能充實、補足「台灣島史」的書寫。誠如孫大川為巴代的小說著序時所言:「以文作史」固然有虛構的成分,但歷經作家的田野調查所營造出的歷史認知,「比學術文獻的堆砌,更能映照歷史經驗的真實」。3此段見解,實呼應新歷史主義論者所主張「文學也是一種參與塑造歷史的能動力量(a shaping power)」,彰顯出文學與歷史間的影響關係並非單向,而是「持續不斷的交流循環過程」,即為新歷史主義者所稱之「協商(negotiation)」。4

¹ 曹永和,〈台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台灣島史」概念〉,《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5 期 (1990.06),頁8。

² 周婉窈,〈山、海、平原:台灣島史的成立與展望〉,收入張隆志編,《島史的求索》(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頁55-71。

³ 孫大川,〈以「文」作「史」——巴代《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收入巴代,《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台北:麥田,2007),頁 10。

⁴ 此段新歷史主義的主張,整理自盛寧,〈新歷史主義的批評實踐〉,收入《新歷史主義》(台北:

上述觀點,不僅顛覆過往歷史研究所主張的「客觀性」,亦如孟淘思(Louis A. Montrose)對於「文本的歷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和「歷史的文本性(the textuality of histories)」之討論:前者指涉個人性的文學表達,亦有著特殊的歷史性,能反映其時代語境;後者則指涉批評者無法接觸到「全面而客觀」的歷史,因此歷史敘述中仍有虛構的話語,背後實為人們「有意識選擇保留與抹去的結果」。5由此觀點出發,作家筆下的歷史,與台灣史研究者的論文,都能視作一種歷史「書寫/敘事」,背後實能折射寫作者的史觀。因此,本文主張在發展「台灣島史」(特別是原住民族歷史)的論述時,亦須關注原住民作家的「以文作史」的書寫實踐,並關注文學創作與歷史文獻之間該如何對話。

綜觀當代的原住民族文學,在以原住民族歷史為題材的作品中,「小說」為一重要表現形式。以日治時期歷經多次理蓄戰爭的泰雅族為例,1995 年泰雅族作家游霸士·撓給赫的《天狗部落之歌》為先驅,即以泰雅族抗日戰爭為題材;2006 年簡李永松(多馬斯·哈漾)的《雪國再見》,則以大豹社事件、插天山戰役等泰雅族重要歷史事件為背景;而 2016 年馬紹·阿紀的《記憶洄游——泰雅在呼喚 1935》則圍繞著 1914 年太魯閣戰爭前後的歷史,也旁及日治初期歷史,與 1935 年學者大島正滿的踏查。上述泰雅族作家的歷史小說,不僅奠基於既有的部落史與台灣史研究,且各個作家亦會經由重返部落踏查與爬梳史料,並採集自身族群的口述歷史來進行創作,故能以原住民族的主體視角,以文學補足「台灣島史」的書寫。

除卻前述的泰雅族作家,卑南族的巴代也是重要的歷史小說寫手。6從 2007 年 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至 2019 年的《月津》,

揚智文化,1995),頁25-45。

 ⁵ 孟淘思 (Louis A. Montrose) 著、陳界華譯,〈文本與歷史〉,《中外文學》20 卷 12 期 (1992.
 05),頁91-92。

⁶ 此外,像是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的多部作品,也常觸及戰後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歷史。而 他於 2022 年出版《沒有信箱的男人》,更是他少數以日治時期歷史為背景之作。他藉由口述歷史 與文獻為基礎,帶領讀者重新反思人類學家與日本殖民政府對達悟族的統治,所遺留的歷史傷 痕。因篇幅限制,本文不於此一一列舉有創作歷史小說的原住民作家。

巴代已完成十一部歷史長篇小說。其中,又可根據主題和年代,分為幾個系列:首先,是以其出身地與相關人物為主題的「大巴六九部落(Damalagaw)」系列,包括《笛鸛》(2007)、《馬鐵路》(2010)與《走過:一個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2010),而後來出版的《野韻》(2018)時空設定在戰後的大巴六九部落,小說中也出現對於馬鐵路的描寫,故筆者將這四本視為同一系列;再者,是巴代自己定義的「檳榔・陶珠・小女巫」系列,以巫術與歷史為主軸,共有三部作品:7包括以荷蘭人進入東部前後的《斯卡羅人》(2009)、《白鹿之愛》(2012),以及後來衍伸出穿越過去與當代時空之旅的《巫旅》(2014)。

除了三部曲之外,還有作為「卑南族歷史人物系列小說」之一的《最後的女王》 (2015)。針對此系列,巴代計畫要寫「八部十一本的長篇小說,企圖藉由這些歷 史人物的現身展演,拉展卑南族進入異族文字記錄的歷史縱深,清楚釐清東臺灣一 直以來族群間彼此的對位關係」,是以「卑南族」為主軸的計畫,⁸也呼應他於創作 初期想成為「部落稗官」的自我期許。⁹

值得玩味的是,2015 年寫下這段「出書預告」後,巴代並未馬上出版「卑南族歷史人物系列小說」的其他作品,反而是將視角轉向「卑南族之外」的族群,開始書寫「他者」的歷史:如與南排灣族歷史息息相關的《暗礁》(2015)與《浪濤》(2017),前者描寫 1871 年的八瑤灣事件,後者則寫後續的 1874 年牡丹社事件。在《暗礁》的後記中,可見得巴代為了創作這部作品,不僅採訪排灣族者老華阿財先生,也接受蔡霜琴老師的指導,才能對「陌生的排灣族文化」有初步認識,展現出其跨族群、文化接觸的嘗試。10另外,更特別的是,2019 年的作品,是以漢人羅漢腳與西拉雅族為主角的《月津》,時空為 1847 年臺南鹽水的八角樓動土前夕,內

⁷ 此部分說明可參見巴代,《斯卡羅人》(新北:耶魯文化,2009)一書折口。

⁸ 巴代,《最後的女王》(台北:印刻文學,2015),頁 269-270。

⁹ 巴代,〈野史·稗官〉,收入巴代,《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頁 14。

¹⁰ 巴代,《暗礁》(台北:印刻文學,2015),頁317。

容觸及性別、階級與族群,亦與他的「大巴六九部落」、「檳榔・陶珠・小女巫」、「卑南族歷史人物系列小說」等系列,呈現出不同的書寫向度。¹¹

若對比於巴代過往以自身部落「大巴六九」,或是自身族群「卑南族」歷史為主軸的作品,便能發現他自 2015 年以降所出版的《暗礁》、《浪濤》與《月津》,已開始銜接到台灣島上的「族群他者」之歷史,並於作品中開展跨族群接觸的課題。此處以「族群他者」為論述用語,乃源於現行法律中,雖統稱十六個原住民族群為「原住民族」,但各族群間的文化、歷史仍有差異,故本文視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為巴代創作時的「自我」,而將排灣族、西拉雅族與漢人視為族群身分上的「他者」,以體現出巴代創作歷程的轉向。12同時,相比於前述的原住民作家多以自身部落與族群歷史為題材,巴代近期的書寫轉向,更值得細加玩味。13本文認為,若將這三部作品並置閱讀,應能開拓出過去論者所未觸及的面向,或能提供我們思忖原住民族如何參與「台灣島史」的書寫課題。

爬梳前人研究,巴代的作品多被放置於「重建部落歷史」、「尋求主體認同」的 脈絡下,以「卑南族」為主體進行研究,¹⁴一如劉亮雅於 2023 年的論文中,仍以

¹¹ 根據巴代自述,《月津》的創作動機源於 2013 年的一場聚會,巴代妻子的朋友提及其祖母有許多故事,歷經多年的醞釀與資料搜尋,才於 2018 年開始創作,最後於 2019 年出版。見巴代、陳芷凡,〈文學,作為一種復返的路徑〉,《印刻文學生活誌》227 號 (2022.07),頁 44。

¹² 當然,「自我/他者」之間絕非二元對立,在巴代的創作中也重視兩者間的「跨文化/族群」接觸,留待後文論述。

¹³ 除了巴代於近期轉向族群「他者」的書寫,瓦歷斯·諾幹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也有書寫上的轉向,如邱貴芬指出其 2014 年的小說集《戰爭殘酷》不再只是以「我族」為唯一主題,更於書寫中觸及其他遭受苦難的他者身影。而 2016 年的散文集《七日讀》則是由「本族的種種課題延伸到不同時空裡其他弱勢社群的苦難」,見邱貴芬,《臺灣文學的世界之路》(台北:政大出版社,2023),頁 111-116。不過,由於本文的論述主軸為原住民作家與「台灣島史」書寫,故不於正文中討論瓦歷斯·諾幹的「他者」轉向,也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提醒。

¹⁴ 學位論文的部分依年代排序:江育錡,〈巴代小說研究〉(嘉義: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蔡佩含,〈社會介入·自然寫作·歷史敘事——以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為考察對象(1970~)〉(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陳湘綺,〈當代台灣原住民族歷史長篇小說研究〉(宜蘭: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論文,2015);盧美辰,〈「族群意識」的建構與轉折:以巴代、達德拉凡·伊苞、里慕伊·阿紀作品為例〉(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劉盈君,〈巴代小說中的部落書寫與歷史敘事〉(新竹: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班學位論文,2017);林依萱,〈巴代《最後的女王》研究〉(屏東: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8)。此外,蘇怡禎雖以「跨種族」為問題意識出發,卻不是討論巴代筆下的不同族群,而是比較不同種族作加如何書寫大航海時代。蘇怡禎,〈對位大航海:

「歷史重構」為題,探討巴代如何改寫殖民者所敘寫的文明/野蠻之對立,進而奪回歷史詮釋權。¹⁵除卻上述脈絡,陳芷凡則曾以「後殖民」、「都市書寫」為問題意識出發,試圖開展不同的論述視野,並經由與其他作家的比較,來重探巴代小說。¹⁶不過,上述論者仍未觸及巴代書寫「族群他者」的作品。

與本文論題最相關的,則是林芳玫 2021 年所發表的〈從地方史到東亞史與世界史:巴代歷史小說的跨文化與跨種族視野〉一文。她以《暗礁》、《浪濤》與《最後的女王》為探討對象,指出巴代善於切換不同族群的視野,並以底層人物為主角,呈顯出不同於漢人主流的史觀,進而讓讀者藉由地方史的書寫,重新認識世界史。¹⁷此篇論文所提出的「暗礁主體」概念,讓筆者注意到巴代在近期作品中,都以海洋相關意象(暗礁、浪濤為海洋常見物象,月津則是港口名)作為篇名,且其隱喻與全書主旨密切相關,故本文將奠基於林芳玫的論述上,進一步探析此三部作品。此外,若與巴代過去以卑南族為主角的作品比較,會發現《笛鸛》、《馬鐵路》,乃至於後來的「小女巫」系列作品中,「海洋」的元素較不明顯。¹⁸也因此,分析這幾部以「海洋相關意象」為篇名之作,或能帶領我們反思巴代如何發展其「海洋史觀」,並能進一步與曹永和的「台灣島史」進行對話。

回顧「台灣島史」的定義,曹永和提倡不僅要以「島上人民」為主體進行研究,更提出要以「海洋」作為認識歷史的新視野,背後蘊含「水域」空間作為「跨族群

朱和之《逐鹿之海:一六六一臺灣之戰》、巴代《白鹿之愛》與 Joyce Bergvelt's Lord of Formosa 的跨種族戰爭書寫比較〉(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15}}$ 劉亮雅,〈巴代《笛鸛》與《白鹿之愛》中的歷史重構〉,《清華學報》 53 卷 1 期($^{2023.03}$), 頁 $^{171-202}$ 。

¹⁶ 陳芷凡,〈「第三空間」的辯證——再探《野百合之歌》與《笛鸛》之後殖民視域〉,《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9 期(2014.10),頁 115-144;陳芷凡,〈田雅各、巴代等人的都市書寫策略與世代關照〉,《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5 卷 4 期(2015.12),頁 1-19。

 $^{^{17}}$ 林芳玫,〈從地方史到東亞史與世界史:巴代歷史小說的跨文化與跨種族視野〉,《台灣文學學報》第 38 期(2021.06),頁 1-34。

¹⁸ 在筆者的整理中,目前只有《斯卡羅人》(2009)第六章〈劈海逃生〉涉及海洋相關背景,巴代於此章寫到大巴六九女巫絲布伊藉由巫術,讓海水分成兩半,以讓主角卡里馬勞一行人躲避乎次林人的追擊。見巴代,《斯卡羅人》,頁 146-187。

接觸」的能動性,交織著複雜的歷史因果關係。19可以說,「台灣島史」的書寫與論述,本身便需要關注到台灣的島嶼性質與海洋史。因此,本文由「台灣島史」的概念框架出發,以巴代的《暗礁》、《浪濤》、《月津》為研究對象,一方面分析作為書名的海洋意象——暗礁、浪濤、月津(港),如何作為巴代筆下的隱喻,且傳達出什麼樣的歷史觀。另一方面,也會探討巴代如何在書寫「他者歷史」的過程中,複雜化既有的「台灣島史」書寫。

在論文架構上,本文第二節先以《暗礁》、《浪濤》為分析對象,探討他如何藉由書寫排灣族歷史事件,彰顯「海洋」與台灣島嶼的連結,及其背後的歷史隱喻與海洋史觀。第三節則以《月津》為分析對象,探討巴代如何藉由相遇於鹽水港的不同族群(漢人、平埔族),敘寫「鹽水港(月津)」的在地商業發展史,與主角柳紀明的個人生命史,且「溪」與「港」的水域空間又建構出何種歷史觀。期以這三部小說的分析,為巴代近年的創作轉向提出一種可能的詮釋路徑與思考框架,同時也以原住民族的視角豐富「台灣島史」的論述與書寫。

二、礁石與海浪的碰撞:《暗礁》與《浪濤》的多重因果敘事

1871年,當時從屬於琉球王國的宮古島人,向琉球中山王國「首里城」納貢後,在回程時先是被強烈的東北季風吹離預定航道,後又遇到罕見的冬季颱風,使得船隻擱淺於台灣東南端的八瑤灣。發生船難後,他們一行人決定棄船,並在遭遇漢人劫掠後,轉向內陸居民求救。一開始,當地原住民高士佛社願意接納他們,卻因為語言不通,使得兩群人互相猜忌,最後釀成五十四名宮古島民被殺害,史稱「八瑤灣事件」。在三年後,日本便以此為藉口出兵台灣,即為著名的「牡丹社事件」。²⁰

前 曹永和,〈台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台灣島史」概念〉,《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5 期(1990.06),頁7-9。

²⁰ 關於八瑤灣事件的歷史,見周婉窈,〈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新」材料與多元詮釋

在過去的歷史教科書中,多只會談論「牡丹社事件」,卻很少深究這件事情的遠因,²¹更無論由排灣族或宮古島人的「在地視角」,來反思兩起事件的「多重因果關係」。²²相較之下,巴代的小說書寫,則透過「在地、微觀」的視角,來重建這段歷史時空:在《暗礁》一書中,單數章為宮古島人的觀點,雙數章則以高士佛社原住民的觀點進行對比,呈現兩群語言不通的人,如何從相遇、短暫接納,到誤解與發生衝突;而在《浪濤》中,單數章是高士佛社與牡丹社原住民的觀點,雙數章則採日本政府、士族的視角,以呈現牡丹社事件背後,實存有複雜的原住民聯盟關係,以及明治維新後不平士族心理的脈絡。在林芳玫的論文中,她指出巴代的這兩部小說,相較於觸及「漢人他者」的《最後的女王》,更成功地編織出多重對話位置,進而開展跨文化與跨種族(族群)的對話。²³奠基於林芳玫的論述上,本節要進一步探討,巴代如何使用「海洋意象」,來開展這種跨文化與族群的對話,並形塑出看待此一事件的歷史觀?

在《暗礁》的第七章〈暗礁〉中,一位姓松川的宮古島人,不顧船長叮嚀,率領其他五人,欲搭乘小艇逃離擱淺的大船。然而,他們出航後很快就因撞上大礁石而翻覆。此時,巴代刻劃較多的宮古島人野原茶武便跳海救援,卻反而因為被強力的海浪衝擊,導致他被重摔到礁石上昏迷。在這場「礁石救援事件」發生之際,牡丹社的亞路谷,以及四格林社的阿帝朋,也正在一旁觀看。面對這群陌生人,除了疑惑,兩人也有一段對話:

「你在看什麼?」亞路谷的聲音從背後傳來。

的可能〉,《臺灣風物》65 卷第二期(2015.06),頁 23-89。

²¹ 宋佩芬、吳宗瀚,〈歷史脈絡性思考與國際視野:以國中社會教科書「牡丹社事件」為例〉,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1 卷 1 期 (2013.03), 頁 83-120。

²² 排灣族與宮古島人的在地觀點,可參考平野久美子著、黃耀進譯,《牡丹社事件 靈魂的去向》 (臺北:游擊文化,2021)。

²³ 林芳玫,〈從地方史到東亞史與世界史:巴代歷史小說的跨文化與跨種族視野〉,《台灣文學學報》第 38 期(2021.06),頁 8-19。

「喔,看看海岸上那些人動靜,他們似乎暫時放棄繼續行動了,剛剛那個被海湧拋上岩石的人,也被移到那個礁石的背風處,他真是勇敢的人啊。」阿帝朋撇過頭說。

「確實是這樣,如果有機會,跟這樣的人交朋友,的確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你真是豪邁啊,亞路谷」。24

在這段對話中,一方面呈現出他們對於野原茶武的敬重,另一方面也為兩個群體日後的相遇埋下伏筆。當兩群人於雙溪口發生衝突時,野原被卡嚕魯砍傷,阿帝朋取出平時吃肉用的小上首,將之放在野原的手上。而卡嚕魯亦表示:

「唉,真受不了你。不過你說的也對,我對這個人確實有好感,他是個勇士, 他也應該是他家鄉部落所倚靠的人。對了,我們該把所有人找回來了,人命 都出了,先前那些爭執憤慨也沒什麼意義了,該結束了。」卡嚕魯說完,朝 屋子內嚷著:「鄧天保,這個人還在呼吸,你幫我看看,能救就請盡量試試 吧。」卡嚕魯說完,與阿帝朋出了院子向溪口匯流處奔去。25

在這段引文中,實則濃縮巴代對於八瑤灣事件中的族群與歷史觀點:在衝突發生前,宮古島人誤以為正要打獵的高士佛社人,是要來取自己的性命,因而不告而別。而高士佛社人則誤會宮古島人偷走他們的小孩,加上不告而別不符合部落文化,最後導致殺戮悲劇。但在野原被卡嚕魯砍傷後,阿帝朋與卡嚕魯才意識到,或許這些「爭執憤慨」都失去意義,呈現原住民視角下的歷史反思。

²⁴ 巴代,《暗礁》(台北:印刻文學,2015),頁71-72。

²⁵ 巴代,《暗礁》,頁 295。

此處的心境轉折,依照先前的伏筆,應是源於阿帝朋等人對於野原「英雄惜英雄」式的欣賞,同時也解消兩個族群的激烈衝突。可以說,巴代之所以於前幾章反覆刻劃野原茶武的智謀與勇氣形象,正是為了在這場雙溪口的殺戮中,提供原住民反思自身舉動的機會。由此可見,巴代並未因為身為原住民,便站在批判宮古島人的立場,反而讓作品中的原住民角色反思這場因「誤會」所形成的衝突,進而暴露跨族群接觸的困境,與複雜的歷史因果關係。

此一困境,不僅提供讀者以原住民視角,重新省視這次衝突,同時逼顯出這些重大歷史事件背後的「多重因果關係」,更接引出「海洋」作為「跨族群接觸」的空間隱喻:回到小說情節,阿帝朋等人對於野原的欣賞,是源於前述的「礁石救援事件」(小說第七章〈暗礁〉)。也因此,圍繞著「礁石/暗礁」所展開的討論,便蘊含此部作品重要的歷史隱喻,體現於小說末尾阿帝朋的反思:

暗礁在那兒,也不在那兒,因為命運,船撞上了,他們遇上了高士佛社人,喪命了。那下十八社呢?這些宮古島人會不會是另一個暗礁?一個引起滔天浪濤的礁岩前,一座致命的始終安靜緘默的暗礁?這件事有可能因為不再被提起而最後被遺忘嗎?²⁶

結合此事件的歷史背景,本文認為此處的「暗礁」所隱喻的,正是造成衝突的歷史因素:如宮古島人的船難,帶來雙溪口的殺戮。同時,藉由這段提問,也將宮古島人的喪命視為另一個暗礁,為三年後發生的「牡丹社事件」埋下伏筆。

在林芳玫的論述中,指出「暗礁」的內涵具有以下五項特質:一、肉眼難以看見;二、潛入海中可以看見;三、是廣義的珊瑚礁,本身即是一個多物種共存的生態系;四、珊瑚礁代表重層的時間性;五、暗礁成為加害者與歸咎對象。此外,她

²⁶ 巴代,《暗礁》,頁314。

認為原住民的主體長期在台灣被漠視,正如海平面下的礁石,並得透過觀視者的「浸潤」,才能看見暗礁——亦即原住民主體的存在。此一主體不同於西方的個人主義,而是與周遭動植物形成的跨物種互動。只不過,在重層歷史事件中,原住民也如暗礁的存在,常被視作加害者。²⁷以上論述,將原住民歷史處境類比為「暗礁主體」,實為洞見。

不過,本文認為此一「暗礁主體」並不能單獨論述,更應結合「浪濤」的海洋 意象,才能完整描述巴代此處所欲傳達的歷史觀,因兩者均產生於「海洋」的空間, 背後蘊和不穩定的關係性,反映出歷史書寫背後實具有「多重因果敘事」。

事實上,在《暗礁》一書中,「浪濤」的意象便已時常伴隨著礁石出現:

那是一大塊的礁石,因海浪的沖刷侵蝕,使得離水的礁面侵蝕狀況嚴重,坑坑洞洞與溝壑縱橫交錯走向;礁岩側面則因長時期漲潮退潮形成崖壁式的沖刷面,其間只有幾處較堅硬的凸起部。²⁸

這段引文出自第七章〈暗礁〉,巴代透過野原茶武之眼,細筆刻劃礁石的外貌。不過,要注意的是,礁石表面所形成的坑洞與溝壑,都是受「海浪」的沖刷侵蝕影響。若結合前述的歷史隱喻,「海浪」作為銜接(articulation)宮古島民與台灣原住民的媒介,而「浪濤」即為海浪與礁石碰撞下的產物,亦即本島族群與外在族群相遇後,所產生的衝突。在野原一行人逃離高士佛社時,他與船長對話時,兩人也逐漸意識到這趟不告而別,或許會像海浪一樣,對於部落產生很大影響:

「就像海潮,當海水隨著湧往岸上推,進入礁石岩盤,開始被切割,形成不

²⁷ 林芳玫,〈從地方史到東亞史與世界史:巴代歷史小說的跨文化與跨種族視野〉,頁 23-24。

²⁸ 巴代,《暗礁》,頁60。

同的力量攪動,那些被切割出來向上向左右捲的力道不停的融合與推進,在下一道海湧推擠結合下,形成一股核心力量,將內部所有不同的力量都捲在其中,向上噴出水柱,或向左右席捲,然後整個往後拖回注入下一道海湧。」「我(本文按:野原茶武)前天被拋到岩礁上,就是這種力量。」

「對,這一回我們得趁著人家不注意,偷偷離開這裡,也是這股力量。那是一股眾人不自覺形成的恐懼所形成的如海湧般的力量,既厚實又充沛。你我明知道對方的善意,但我們改變不了這個態勢。他們對我們的善意,以及我們的無禮,將會被下一道力量所吸收與整合。我們該擔心的是,這兩種因素又將會形成怎樣的衝擊結果?」²⁹

巴代藉由船長這段充滿歷史觀的言語,所欲傳達的是,歷史的力量正如「海湧 (海浪)」,往往是在眾人「不自覺」中所形成的,只憑幾個人之力是無法改變當下 的狀況。而這股力量,又會被下一股力量所吸收整合,傳達的正是歷史事件中的多 重因果關係。在此段引文中,野原茶武再次提及「暗礁救援事件」與這股海浪的力 量,可見巴代於《暗礁》中試圖將具體事件與歷史隱喻連結起來。在這段引文後, 船長也表達出,若要改變當前現況,只能耐心等待,小心不讓自己被淹沒,再抓住 機會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前進。

本文認為,以「小人物」視角來書寫歷史的巴代,雖指出歷史事件是由小人物 的行動所構成的,卻也明白不能輕易將歷史的對錯二元劃分,或是簡單歸諸於幾個 人身上。對他而言,所謂的歷史,實則形構自不可抗力的大結構與小人物所構成的 「多重因果敘事」。此一史觀,正寄託於「暗礁」與「浪濤」的意象之中。

釐清《暗礁》中的海洋意象所隱含之歷史觀後,便能將《浪濤》放置於同一脈絡下分析。《浪濤》的時空始於 1873 年豬勞東社的大族長卓杞篤病浙,象徵著琅嶠

²⁹ 巴代,《暗礁》,頁 264-265。

十八社的聯盟瓦解。同一時間點,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政府,聽從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的建議,準備以 1871 年的八瑤灣事件為理由出兵台灣,以消解日本國內在「征韓論」失敗後的政治危機。³⁰

在此一事件中,原住民族並非在戰場上初次認知到「日本人」的存在,而是在 第五章〈社寮風雲〉中,當卡嚕魯與阿帝朋來到以平埔族為主的社寮部落,意外得 知日本人要用大船派來「二百五十個一百人」。那時,阿帝朋驚訝地說:

阿帝朋嚥了嚥口水說,「我說的是,光是那些琉球人的小船我們就驚訝不已, 到現在船都被浪濤摧毀了,我們都還沒搞懂跟航海有關的知識。現在來的這 些日本人,似乎更強大,懂得更多.....」³¹

在阿帝朋的認知中,琉球人的「小船」便已是強大的外在力量,對於部落產生影響,故更加畏懼日本人的勢力。值得注意的是,阿帝朋的言辭中,提到船被「浪濤」摧毀。在此處,「浪濤」不只是作為能夠摧毀船隻的自然現象,巴代亦援用「水」的時間隱喻,來傳達三年前那場激烈衝突,如今已成為過去的歷史。而日本人,似乎是更強大的「浪濤」,可能對原住民部落帶來更不可想像的影響。

在《浪濤》的雙線敘事中,〈鬼域冥土〉一章描述日本軍隊在石門隘口擊斃了 牡丹社頭目亞路谷父子後,日軍少佐樺山資紀向士族出身的田中與藤田,以「浪濤」 為喻,說明日本人此次出兵所帶來的影響:

「兩位啊,我們就像一波波滔天巨浪拍擊上岸,浪濤所及,樹倒草偃,地表

³⁰ 此處日本發動「台灣出兵」的脈絡,可參考周婉窈,〈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新」材料與多元詮釋的可能〉、羅伯特·埃斯基爾森 (Robert Eskildsen)著、林欣宜譯,《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台灣出兵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21)。 31 巴代,《浪濤》(台北:印刻文學,2017),頁 107。

都要刮出幾道徑流,看上去,全都要改變了。藤田君,田中君,我們改變了這裡,改變了局勢。」樺山又說。

「所以,我們最後也要像波浪,濺灑拍碎了前浪,退潮而回等候後浪了。」 田中忽然接話,今樺山與藤田感到愕然。

「哈哈哈,對,我們必須退回去,必須等候東京的政府中央召喚,而後凱旋回去。就像浪濤,準備下一回的捲起。接下來就是外交的戰場了,我也得離開這裡換個戰場啊。」樺山說。32

在樺山資紀與田中兩人的對話中,皆以日本人的視角詮釋「浪濤」的隱喻。在 樺山的認知中,日本軍隊正是改變此地局勢的浪濤,且他把握浪濤的「循環往復」 特質,相信這一波浪濤過去,還會有「下一波的捲起」,亦即對國際局勢的影響。 而田中身為在明治維新後地位下降的「士族」階層,則是從自身經驗出發,提出「後 浪推前浪」的觀點,描述社會地位於歷史長河中的更迭。由此可見,「浪濤」的意 象在不同身分地位的日本人心中,亦會產生不同視野的歷史詮釋。

不過,若將這段話放回這一章〈鬼域冥土〉,又可再豐富「浪濤」的內涵。巴 代於此描寫成功出兵的日本軍隊,最後卻敗在傳染病——當時,日本遠征軍的病歿 人數五百多人,遠超過戰死的十九名。將此一背景結合「浪濤」有起有落的特質, 樺山資紀口中的「下一回的捲起」,似乎也是呼應日本在這場戰事中,並非全然勝 利,最後仍是敗給台灣的風土與傳染病。

而《浪濤》的最後一章〈巴沙佛達〉,時空已來到 1875 年的恆春。於此時間點,日本軍隊已撤兵,換來的是清國的築城與駐軍。在阿帝朋的眼中,他再次感受到清國的到來,將成為另一波浪濤:

³² 巴代,《浪濤》,頁107。

他忽然聯想到整個琅嶠半島面對如浪濤般,接替輪番而來的強敵所造成的衝擊,以及各社之間關係的改變,那其中存在的「巴沙佛達」,先是日軍,現在是清國,要勉強各社配合與改變,何嘗不是「巴沙佛達」?而各社基於種種現實考量,勉為其難的接受這些原先不該出現的變局,根本就是「巴沙佛達」。那些浪花的掀起、拍岸、碎裂與灘頭的捲退、改變容貌,在更龐大的局勢中,何嘗不也是「巴沙佛達」?33

「巴沙佛達」是排灣族語的「勉為其難」。在歷經《暗礁》的八瑤灣事件,與《浪濤》的牡丹社事件後,面對清國到來的阿帝朋,已形塑出個人面對歷史變遷的視角。這些外來勢力,始終如同不斷衝擊岸邊的海浪,所掀起的浪濤,或快或慢地改變了琅嶠半島的局勢。而「巴沙佛達」,似乎也不只是阿帝朋的個人觀點,更是這座島嶼的原住民族,數百年來面對主權更迭時,逐漸發展出來的應對態度。

總結上述,巴代於《暗礁》與《浪濤》中轉向「他者歷史」的書寫,既打造出原住民族的在地觀點,以及宮古島人、日本士族與統治階層等不同視角的雙線敘事,更進一步透過不同族群對於海洋意象的詮釋——從「暗礁」的多重隱喻出發,到外來強權的「浪濤」拍打,開展出小說中的多重因果敘事,以刻劃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更重要的是,此一書寫實踐,不僅能在新材料出土之際,複雜化這起事件的歷史詮釋,34亦呼應曹永和「台灣島史」的思考框架,揭示台灣這座島嶼如何藉由「海洋」連結到世界,進而呈顯原住民族視角下的海洋史觀。

三、曾經繁盛的港口與欲望:《月津》中的商業史與個人史

《月津》一書的時空,坐落在1847年的「月津港」(今台南市鹽水區),那時

³³ 巴代,《浪濤》,頁 322。

台灣尚未開港通商,與中國通商口岸的貿易仍以郊行主導。此部小說的主角為來自泉州布商的柳紀明(阿明),為了逃避家族的逼婚,而獨自一人來到鹽水港,成為以打零工維生的「羅漢腳」。他隱瞞自己的身世,並與當地西拉雅族的古阿萊、西蒙、拔初,蘇奈等人,以及經商的葉開鴻結識。除了身世,柳紀明也隱藏自己對於古阿萊的同性情慾,而小說的尾聲,在古阿萊與一女子阿芬訂婚後,失戀的柳紀明便默默返回泉州。

將這部小說放置於巴代的創作史中,可謂一特別突出之作。首先,一如本文前言所提,自《暗礁》、《浪濤》以降,巴代的作品便開始嘗試「不以卑南族為主體」,改以「他者的歷史」為主軸。再者,以排灣族為主的八瑤灣事件與牡丹社事件,在地理與族群關係上,都與卑南族生活的台東平原較近,或許是巴代書寫此一事件的動機之一。相較之下,《月津》不僅將小說時空轉至1847年的台南鹽水港,是地理位置上已不再是東台灣,且裡頭出現的西拉雅族,亦是巴代過去未曾描寫過的平埔族群。由此可見,《月津》應採取不同的論述框架來分析。

於前行研究中,論者幾乎都會論及巴代如何藉由寫史的過程,來保存部落文化的細節,此亦為原住民族文學的重要課題。然而,《月津》一書主題跳脫既有論者的框架,巴代在此書中既不寫卑南族,亦無意細筆刻劃西拉雅族的文化,反而著重於鹽水港的繁盛,以及柳紀明個人的內心情感,值得深究其書寫動機,並與巴代過往的作品進行比較。35

回到本文的問題意識,本節欲分析圍繞著「月津(鹽水港)」的海洋相關意象, 在巴代筆下作為何種隱喻?在這些隱喻中,又和此地的商業史、柳紀明的個人史有 何關聯?最後,巴代藉由商業史與個人史的描寫,又能如何帶領讀者看見當前台灣

³⁵ 目前的討論皆以「同志情感」的角度切入,如陳妍融,〈原住民文學中的同志書寫——以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月津》、《山地話/珊蒂化》、《我長在打開的樹洞》為例〉(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2);陳伯軒,〈霧漸漸散去的時候:讀巴代《月津》〉,2021.01.30(來源:「作家生活誌」,https://showwe.tw/blog/article.aspx?a=30292 ,2023.03.26 瀏覽)。

史中較被忽略的部分,以銜接既有的「台灣島史」書寫?

首先,從「港口」相關意象開始分析。在首章〈鹽水港〉中,柳紀明搭上船長 王仔的船,從鹽水港出發,前往福建的泉州、福州等地,載著滿船的糖與米糧,要 到中國東南沿海的港口進行交易,並於中秋節前返回鹽水港進行交易。在這艘船 上,柳紀明認識了被稱為總管的商人葉開鴻,也開啟小說後來的故事。值得注意的 是,巴代於第一章中,便透過柳紀明在航程中所見,埋下伏筆:

八掌溪由東朝向西流動,在「布袋嘴(港)」出海。由於河道寬敞,溪水飽足,其夾帶的泥沙也很可觀,在布袋嘴外隨著溪水強度與海潮暗流的不斷推擠、改道而淤積成為暗沙,或堆積成為沙洲。使得這個潟湖將近四公里長寬的水域,布滿暗沙與沙洲,令每一艘進出的船隻謹慎不敢大意。36

在這段對於八掌溪的描寫,實則預告「鹽水港」,日後可能因泥沙淤積而沒落。 回顧《鹽水鎮誌》的記載,道光末期的「八掌溪泥砂填積,海岸線逐漸東移,鹽水 不再臨海,海港功能遂告喪失」,只能通行竹筏。到了光緒十一年(1885),瘟疫加 上急水溪氾濫,鹽水港更加衰落,也導致該地市街不再如過往繁榮。³⁷而與港口淤 積密切相關的,便是貫穿這本小說的「商業史」。

論及台灣在開港通商前的重要商港,便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諺語。不過,若談及第四大的商港,也有「四月津」的說法。在正史上多以「鹽水港」來稱呼,而「月津」的語境則更能凸顯鹽水港的商業繁榮時期。由此可見,巴代以《月津》為題,正是意圖書寫較少人認識的鹽水港商業史。同時,「溪」作為一處「自然水域」,與「人造」的水域「港口」,則於此作中形成張力,隱喻著月津的商業史興衰,

³⁶ 巴代, 《月津》(台北:印刻文學, 2019), 頁 7。

³⁷ 陳明照等編,《鹽水鎮誌》(台南:鹽水鎮公所,1998),頁4-7。

乃是源於外在情勢(自然)與故事角色(人物)之間的拉扯。

回到小說文本,於首章登場的船,除了載運要返回鹽水港買賣的物品,同時也還有葉開鴻立志要「起大厝」的建材。到了小說的結尾,便描寫到 1847 年葉家著名的八角樓開始動土。八角樓為「葉連成商號」主人葉開鴻及其兒所建的兩層樓建築,而「葉連成商號」則是清道光年間鹽水港一帶著名的蔗糖經銷商,可以說,八角樓象徵著葉家與鹽水港的興盛期。38

林美惠曾梳理「葉連成商號」的發展:從葉開鴻原受雇於糖商,後遷居至糖的集散地鹽水港,負責採買作業。在熟悉糖業買賣的流程後,便開始與四個兒子(葉瑞西、葉百畝、葉春庭、葉澄波)獨立經營糖行,後慢慢發展茁壯。³⁹對照論文中的「正史」與「口述歷史」,⁴⁰巴代則於小說中加入羅漢腳柳紀明,與當地西拉雅族古阿萊等人的參與。從首章〈鹽水港〉的相遇後,葉開鴻便覺得柳紀明是「有故事的人」,⁴¹故他於中秋節踩街繞境時,邀請柳紀明與古阿萊一行人,一同陪他去新港社(新化)收購紅糖。在這趟新化之旅中,葉開鴻向古阿萊提出「種甘蔗」的想法,最後在柳紀明的建議下,古阿萊等人的番仔寮部落決定拋開過去被漢人欺騙的經驗,開始嘗試種甘蔗,進而協助葉開鴻發展糖行的生意。

由此可見,對照於《鹽水鎮志》與學者論文,巴代試圖敘寫「正史之外」的歷 史想像:在鹽水港尚未淤積沒落的「月津」時期,葉家的壯大,是有羅漢腳與西拉 雅族一同參與的,而這也能帶領讀者反思,在 1847 年的鹽水港,漢人與原住民族 之間的互動,是如何共築商業繁榮的景象。

不過,除了原漢共同參與的歷史圖象,《月津》並未迴避存在於清代台灣的原 漢衝突。如柳紀明與古阿萊等人參加中秋踩街活動時,遇到想要騙蘇奈錢的羅漢腳

³⁸ 陳美惠,〈從文化資產的保存觀察戰後「鹽水八角樓」的轉化(1945-2013)〉,《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8期(2013.09),頁41。

³⁹ 同前註。

⁴⁰ 此處的「口述歷史」,是指陳美惠的論文中,有一部分參考資料是來自葉家後代的訪問。

⁴¹ 巴代,《月津》,頁20。

攤販,且柳紀明因勸蘇奈不要買,而與對方起了衝突:

「幹你娘的,平平是羅漢腳,我好不容易找了生意來做,卻遇到你這種管閒事的擋財路,要換作幾年前的我,早就殺了你,滾開。幹你娘的,你幫這些番仔是怎樣?你想裝好人騙他們的土地嗎?」柳紀明的動作讓小販發火,那意味著生意做不成了,聲音拉高了。也連帶吸引一些人旁觀。

「還有,你們這些番仔,要小心這種人!他會騙你們的土地,還有女人,尤其是妳!」⁴²

在羅漢腳攤販的怒言中,透露出幾個存在於清代台灣社會的問題:第一個是「族群」議題,包括漢人騙原住民的土地與女人,這也呼應番仔寮部落曾被來自麻豆的商人騙作黑麻的經驗,⁴³以及後來古阿萊等人在市集中被漢人投射異樣目光,⁴⁴都呈現出原漢之間仍存有緊張關係;第二個則是「階級」問題,由攤販之言可見,他認為「羅漢腳」之間的階級相似,都是在社會底層努力維生的人,故質疑柳紀明擋財路的行為。然而,柳紀明的出身並非羅漢腳,實為社經地位較高的泉州布商,而他也是透過從小習得的經商能力,才能識破攤販欺騙西拉雅族的行為。由此可見,此一衝突背後實隱含著「階級差異」。

不過,相較於對原漢與階級衝突的刻劃,《月津》一書著墨較多的,仍是原漢 共築的商業繁榮景象。在〈糖郊〉、〈洋行的訊息〉、〈倉庫的閣樓〉、〈蘇奈的表白〉 等章的開頭,均是從鹽水港口的貨物裝卸的繁忙,以及柳紀明與古阿萊等人在搬運 貨物的部分起筆。45在故事發展中,《月津》也預告「洋行」的興起,以及鹽水港的

⁴² 巴代,《月津》,頁37-38。

⁴³ 巴代,《月津》,頁89-93。

⁴⁴ 巴代,《月津》,頁 56。

⁴⁵ 可參考巴代,《月津》,頁 84、143、161、219。

商人試圖把握時機,掌握洋行的新趨勢。⁴⁶在《鹽水鎮誌》的記載中,鹽水港由於保有自己的買賣系統,所以沒有像台南北郊一樣,在洋行介入糖市場後便陷入不振,甚至是台灣最早有德記洋行與怡記洋行的分公司之地。⁴⁷可以說,經由葉開鴻等人的努力,實則延長「月津」時期的繁榮。

由上述鹽水港商業史的爬梳,與小說文本的分析進行對比,可見得巴代雖在首章便藉由柳紀明之眼,從八掌溪的描寫,暗示了鹽水港的淤積命運。但在小說人物跨越族群的努力下,仍然打造出鹽水港的繁盛景象。到了小說結尾,這些「月津時期」的繁榮,則化作「八角樓」動土的象徵。因此,「八掌溪」的大量泥沙淤積象徵的是必然的歷史發展與命運,但在「港口」發生的這些故事,則凸顯出底層人物的能動性。也因此,「溪」與「港」的意象,本身便隱含著巴代以小人物出發,書寫在地商業史的歷史觀——在「自然水域」與「人造水域」的交會下,呈顯出月津港的興衰史背後,不僅存有「人物能動性」,也有不可控制的「歷史情勢」(泥沙淤積),亦近似於《暗礁》與《浪濤》中所寄寓的歷史隱喻。

除了商業史的書寫外,《月津》的另一條主線,則為柳紀明個人的身世與情感。 出身泉州布商的他,由於追求自由的渴望,故在逃婚後獨自來到鹽水港。對於自由 的渴望,巴代也在首章〈鹽水港〉中,便有所暗示:

「郊行也是這樣嗎?」柳紀明喃喃的說。想起了台南府城以及鹽水港鎮那些 繁多又不同名號的商郊,也是一團團一圈圈的各自形成勢力,各自佔有地 盤,而手下總是群聚一群為他們工作的人。

那我也是其中一隻白鷺鷥?想到這兒,他忽然覺得沒趣。……就算是隻鳥, 我應該是隻夜鷺吧?柳紀明心裡想著夜鷺總是獨自孤鳴、飛行、覓食、不群

⁴⁶ 可參考巴代,《月津》,頁 104-105、147-148。

⁴⁷ 陳明照等編,《鹽水鎮誌》,頁92。

聚也孤單夜宿,卻沒說出口。48

渴望成為「夜鷺」的柳紀明,因而選擇成為以自由的散工維生的「羅漢腳」。 對他而言,當個羅漢腳是相當自在的。在他之後向葉開鴻坦白身世時,他也指出這 種隨性的生活讓他覺得「這就是生命」。49可以說,擺脫嬌貴公子的身分後,柳紀明 深刻透過羅漢腳的生活,重新尋得生命的意義。

不過,渴望獨自一人的柳紀明,在小說中卻常與古阿萊、西蒙、拔初三人一起上工,似乎異於首章的心態。當讀者閱讀到小說中段,便可意識到柳紀明對於古阿萊懷抱的情感。在〈新化之旅〉中,眾人一同睡在一起,「體味」開始飄散,而古阿萊的體味最吸引他,也是他之所以緊緊跟隨古阿萊作粗工的原因。巴代在此為柳紀明的個人生命史,開出了「階級轉換」之外的另外一個命題——即為「性別」的摸索與情慾流動,也與海邊、港口周圍所見的物象有所關聯。

在首章〈鹽水港〉中,除卻描寫柳紀明在港邊看見白鷺鷥與夜鷺外,巴代也花 費很多篇幅描寫夕陽的色彩,並將其作為柳紀明性別認同的隱喻:

那是一顆巨大火紅的夕陽,其上方一小彎弧被一塊雲遮蔽……他注意到那水面金色鱗片似的粼粼波光,宛若他在泉州廟會常見的藝閣衣衫上的金彩,忽然碎裂而灑上水面;那浮動的、柔軟的暗影,猶如那些被裝扮的小女孩,吃驚不知所措的眨著眼,在一片金海中閃動黑色睫毛,輕顫、波動又閃閃光亮,他悄悄分神又覺得開心。50

於此段引文中,夕陽與波光在柳紀明的眼中成為「藝閣衣衫」的色彩,讓他想

⁴⁸ 巴代,《月津》,頁11。

⁴⁹ 巴代,《月津》,頁192-193。

⁵⁰ 巴代,《月津》,頁9。

起「被裝扮的小女孩」。結合故事中他與藝閣仙女「小芬」的相遇、對於蘇奈身體的欣賞,與回憶中對於姊姊們更衣時不小心露出的身體,皆可見柳紀明對於女生身體的親近。然而,在〈蘇奈的表白〉中,他卻也清楚向蘇奈表示,自己對蘇奈的情感,是「一個女人喜歡一個女人的欣賞與讚嘆」,而非生理需求的欲望。⁵¹

在 1847 年的清代,尚未出現「同性戀」的概念,對於同性之間的情感交流,小說中以阿才「夫妻」的交流為代表。在柳紀明的認知中,這樣的「夫妻/伴侶」關係在府城與鹽水港都不只一對。⁵²在小說最後,王仔船長,也向柳紀明傳達自己與他有「相同的情感,相同的敏銳」。⁵³由此可見,這些不能向外張揚,卻又真實存在的「夫妻/伴侶」關係,一方面既是柳紀明生命史中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也是「正史」中所沒有記錄下的個人情慾史。

這雖然不是巴代第一次以愛情為主題,來書寫歷史小說,⁵⁴但描寫存在於清代台灣的男男情誼,卻是台灣文學史上少見的作品。⁵⁵因此,此書的推薦序邀請研究台灣同志文學史的紀大偉,與身為同志的卑南族作家馬翊航所撰寫,凸顯這本作品在「性別」議題之重要地位。⁵⁶而性別與歷史交織下的「月津」,又成為什麼樣的港口呢?在得知古阿萊與木工青仔師傅的女兒阿芬訂婚後,失戀的柳紀明上了「同道人」王仔船長的船前往泉州,在聊天當中,柳紀明望著被霧氣忽隱忽現的鹽水港,有著以下的感悟:

⁵¹ 巴代,《月津》,頁235。

⁵² 巴代,《月津》,頁121。

⁵³ 巴代,《月津》,頁252。

⁵⁴ 可見巴代,《白鹿之愛》(台北:印刻文學,2012),小說文案主打「台灣文學史上第一部深刻描述卑南族女子面對情愛的作品」。

⁵⁵ 在近年的歷史小說創作中,楊双子也以「百合」視角,書寫日治時期可能就存在的女女情誼。在鄭芳婷對楊双子《花開時節》的研究中,取徑酷兒研究,認為這部小說的敘事結構挑戰線性史觀與官方詮釋,進而產生一組不同於歐美主流酷兒論述的台灣酷兒敘事學,並藉由日常細部描寫,發展出在地的「鋩角」批判模型。由此可見,楊双子從「性別」的個人視角,為既有的歷史小說開啟新的視野,亦可提供我們重新反思巴代於《月津》中置入性別視角的動機。鄭芳婷,〈打造台灣酷兒敘事學:楊双子《花開時節》作為「鋩角」行動〉,《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 47 期 (2020.12),頁 93-126。

⁵⁶ 可見陳妍融,〈原住民文學中的同志書寫——以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月津》、《山地話 /珊蒂化》、《我長在打開的樹洞》為例〉一文的討論。

「我第一次知道鹽水港可以這麼美,它應改名叫『月津』,月迷津渡。那是一件多麼文雅的事啊。這水面太美,月光太美,鹽水港的房影透過水面霧氣,也有幾分搖曳,美啊。……」57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至此才首次出現「月津」的名稱:可以說,經由命名, 巴代不僅賦予鹽水港的別名「月津」一層情感上的意義,更讓柳紀明的個人史成為 「月津」歷史的一部分。由此可見,《月津》不僅運用「溪」與「港」的海洋相關 意象,呈顯「歷史情勢」(泥沙淤積)與「人物能動性」(發生於港口的故事)如何 相互糾纏成鹽水港的商業史,更透過柳紀明在海上與港邊所見的鳥、夕陽、霧等意 象,讓他的情慾與「月津」的在地史緊密交織,敘寫「正史」之外的個人生命史, 體現文學參與「台灣島史」書寫的可能。

四、結語

「我始終是將自己定位為一個族群文史的工作者,寫小說只是我保存、建立部落文史的手段之一,創作出版是企圖喚醒部落的記憶。」58

巴代於 2013 年的演講中,將自己定位為「族群文史工作者」,正如自 2007 年的《笛鸛》以來,他陸續創作以卑南族為主體的歷史素材小說,⁵⁹時代橫跨荷治、清領、日治到戰後,「以文寫史」的書寫計畫亦持續進行。不過,他卻也在這場演講中提到,自己預計於同年 12 月完成以八瑤灣事件為主題的長篇小說《暗礁》。由

^{57 「}月迷津渡」出自北宋詞人秦觀的〈踏莎行·郴州旅舍〉,引文見巴代,《月津》,頁 251。 58 巴代演講,顏訥紀錄整理,〈文學作品的史料、巫覡與愛情〉,《文訊》335 期(2013.09),頁

<sup>133-138。

59</sup> 巴代強調自己的作品僅是「歷史素材小說」,源於他對於歷史學方法論的陌生,以及對於「歷史

⁵⁹ 巴代強調自己的作品僅是「歷史素材小說」,源於他對於歷史學方法論的陌生,以及對於「歷史文獻」的不信任。巴代、陳芷凡,〈文學,作為一種復返的路徑〉,頁 46-47。

此可見,他一邊寫自己族群的歷史,同時也一邊將歷史關懷的視野,擴及「卑南族 以外」的族群歷史。本文所欲探問的是,除了描寫這些族群的文化細節,曾表示「每 部小說都有一個核心議題,而非單純的歷史陳述」的巴代,⁶⁰為何嘗試以「他者歷 史」為書寫對象?背後又蘊含何種歷史觀?

本文認為,巴代近期的書寫轉向,並非止於個人書寫歷程的層次,更能具有銜接「台灣島史」論述的可能,是為原住民作家中的重要個案。因此,本文嘗試以曹永和所提出的「台灣島史」為概念框架,探討《暗礁》、《浪濤》、《月津》三本小說如何書寫「他者的歷史」,並補充既有的台灣史書寫。此外,受林芳玫所提出的「暗礁主體」所啟發,⁶¹加上曹永和的「台灣島史」實以「海洋史觀」為基礎,故本文關注於三部小說中如何經營「海洋相關意象」,再叩問這些意象與哪些情節互涉、交織,並如何呈顯出巴代的歷史觀。

首先,在《暗礁》與《浪濤》兩書中,最重要的海洋相關意象,即是作為書名的「暗礁」與「浪濤」。在小說中,「暗礁」隱喻著造成衝突的歷史因素:如後續在雙溪口的殺戮,以及三年後衍伸的牡丹社事件。接著,本文也指出小說中的「礁石救援事件」,讓原住民族對於宮古島人野原茶武有所敬意,因而在引發殺戮衝突時,促成原住民族自身的反省,意識到一切的衝突可能都源於「誤會」,亦為巴代採取雙線結構,重新以在地視角書寫八瑤灣事件的動機。

除卻「暗礁」的意象,本文認為林芳玟所指出的「暗礁主體」並不能單獨論述,而應結合「浪濤」的海洋意象,才能完整描述巴代所欲傳達的歷史觀。從《暗礁》到《浪濤》,「浪濤」意象都不斷伴隨著礁石出現:從野原茶武與船長的對話、原住民內部的反思,到後來日本軍隊出兵台灣,都可見得巴代透過不同角色之口,揭示「浪濤」作為難以控制的外來力量之隱喻。其背後所隱含的歷史觀,便是揭示重大

⁶⁰ 此一自述見巴代,〈史料、口傳故事的改寫創作〉,《文訊》320 期(2012.06),頁 102。

⁶¹ 林芳玫,〈從地方史到東亞史與世界史:巴代歷史小說的跨文化與跨種族視野〉,《台灣文學學報》第 38 期(2021.06),頁 1-34。

歷史事件雖然是由小人物的行動所構成的,卻不能輕易將歷史的因果簡單歸諸於個人身上。對巴代而言,歷史是由不可抗力的大結構與小人物所構成的,正如礁石與海浪碰撞後所產生的浪濤——且兩者均產生於「海洋」的不穩定空間,反映歷史事件背後具有「多重因果敘事」,亦是他建構海洋史觀的歷程。

而在《月津》中,巴代不以重大歷史事件為背景,而是尋找「正史」中不被注意的那些歷史,如在「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商業史之外,他選擇以「四月津」的鹽水港為小說空間,描寫開港通商前的 1847 年,在鹽水港的不同族群、階級與性別之間的互動。於第三節的分析中,本文首先指出,巴代雖於首章暗示八掌溪所攜帶的大量泥沙,未來可能會造成港口淤積。但他轉以描寫商人葉開鴻、出身泉州布商的主角柳紀明,以及西拉雅族的古阿萊等人,跨越族群的藩籬,在常有原漢衝突的清代社會,共同成就鹽水港的繁盛景象,也讓葉開鴻在小說結尾能使「八角樓」動土。因此,面對「溪」(自然水域)所帶來的命運與歷史情勢,生活於「港口」(人造水域)的小人物們則凸顯出自身能動性,共築此地的商業史,也體現巴代所欲寄寓的歷史觀。

除了商業史外,本文也於第三節指出,主角柳紀明的個人生命史,也參與了「月津」歷史的建構。透過柳紀明於首章〈鹽水港〉的視線,他捕捉到船隻入港前的諸多意象:如以「白鷺鷥」與「夜鷺」的對比,凸顯自身渴望自由;又以海面上的「夕陽」色彩,指涉內心想作為女性的性別認同。在入港之後,他又以「氣味」為媒介,意識到自己對於古阿萊的情欲。然而,最後這段無疾而終的戀情,使得柳紀明的心思,像是圍繞著鹽水港的「霧」,在月色下迷失了自我,只得搭著「同道人」王仔船長的船,回到故鄉泉州。由上述分析可見,巴代經由柳紀明在入港與離港前所見之物,交織為柳紀明的個人生命史。而繁盛的「月津」港,與柳紀明勃發的「同性情欲」,皆是「正史」中較少被書寫的歷史。從流動的情慾到歷史的興衰,月津港所連結的「海洋」,又會為鹽水在地的商業與柳紀明帶來何種變遷?並能如何補遺

當前「台灣島史」的書寫?這些提問,留待日後巴代出版「鹽水三部曲」後再持續探討。⁶²

由上述分析可見,巴代將步履踏出部落,藉由「海洋相關意象」來書寫「族群他者」的歷史,並帶領讀者望見「海洋」如何為台灣這座島嶼帶來新的變局:從港口的繁榮到淤積,或是外來的浪濤,相互作用、構築為清代的臺灣史,呼應曹永和「台灣島史」所提倡的海洋史觀。此外,這三部作品皆採取「在地觀點」:如《暗礁》與《浪濤》中,有著「宮古島人/原住民族/日本人(統治階層與士族)」的視角,《月津》則採取柳紀明與葉開鴻的個人視角,再次彰顯文學介入主流歷史論述的可能。同時,巴代的創作,不僅為原住民族的歷史小說開拓新的思辯空間,更能為臺灣歷史小說複雜化「原/漢/平埔……」等跨族群對話的可能,進而複雜化「台灣島史」的書寫。

回到本文最初的叩問——源自台灣史學界的「台灣島史」,能如何與當代台灣歷史小說進行對話?本文以「台灣島史」中所強調的「海洋」作為分析主軸,揭示巴代由跨族群接觸的視角,帶領讀者從「海洋」——此一變動、不穩定性的空間場域,望見台灣與近代國家日本的一次次碰撞,或是貿易港口中少為人知的歷史,進而建構其海洋史觀。本文認為,歷史的書寫與編纂,並非只掌握在歷史學家手中,經過大量田野調查與史料爬梳的小說家,亦可參與「台灣島史」的書寫歷程。甚至應該說,在形塑島嶼主體歷史的過程中,原住民族文學的存在提醒我們如此銘記:正因為有著原住民作家的書寫,「台灣島史」方能更加完整。

⁶² 巴代、陳芷凡,〈文學,作為一種復返的路徑〉,《印刻文學生活誌》227號(2022.07),頁 42-59。該期也收錄三部曲之二《八角樓下》(尚未出版)的部分段落。

引用書目

專書

- 巴代,《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台北:麥田,2007)。
- 巴代,《斯卡羅人》(新北:耶魯文化,2009)。
- 巴代,《最後的女王》(台北:印刻文學,2015)。
- 巴代,《暗礁》(台北:印刻文學,2015)。
- 巴代,《浪濤》(台北:印刻文學,2017)。
- 巴代,《月津》(台北:印刻文學,2019)。
- 巴代,《白鹿之爱》(台北:印刻文學,2012)。
- 平野久美子著、黃耀進譯,《牡丹社事件 靈魂的去向》(台北:游擊文化,2021)。
- 邱貴芬,《臺灣文學的世界之路》(台北:政大出版社,2023)。
- 陳明照等編,《鹽水鎮誌》(台南:鹽水鎮公所,1998)。
- 盛寧、《新歷史主義》(台北:揚智文化,1995)。
- 張隆志編、《島史的求索》(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 羅伯特·埃斯基爾森(Robert Eskildsen)著、林欣宜譯,《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 臺灣出兵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21)。

期刊論文

- 宋佩芬、吳宗瀚、〈歷史脈絡性思考與國際視野:以國中社會教科書「牡丹社事件」 為例〉、《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1 卷 1 期(2013.03), 頁 83-120。
- 林芳玫、〈從地方史到東亞史與世界史:巴代歷史小說的跨文化與跨種族視野〉、《台灣文學學報》第38期(2021.06),頁1-34。
- 周婉窈,〈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新」材料與多元詮釋的可能〉,《臺灣風物》65卷第二期(2015.06),頁23-89。
- 曹永和,〈台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台灣島史」概念〉,《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15期(1990.06),頁7-9。
- 陳美惠,〈從文化資產的保存觀察戰後「鹽水八角樓」的轉化(1945-2013)〉,《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8期(2013.09),頁39-58。
- 陳芷凡,〈「第三空間」的辯證——再探《野百合之歌》與《笛鸛》之後殖民視域〉,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9期(2014.10),頁115-144。
- 陳芷凡,〈田雅各、巴代等人的都市書寫策略與世代關照〉,《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5 卷 4 期(2015.12),頁 1-19。
- 劉亮雅,〈巴代《笛鸛》與《白鹿之愛》中的歷史重構〉,《清華學報》53 卷 1 期 (2023.03),頁171-202。
- 鄭芳婷,〈打造台灣酷兒敘事學:楊双子《花開時節》作為「鋩角」行動〉,《女學

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47期(2020.12),頁93-126。

孟淘思(Louis A. Montrose)著、陳界華譯,〈文本與歷史〉,《中外文學》20卷12期(1992.05),頁65-109。

碩博士論文

- 江育錡、〈巴代小說研究〉(嘉義: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 林依萱,〈巴代《最後的女王》研究〉(屏東: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8)。
- 陳湘綺、〈當代臺灣原住民族歷史長篇小說研究〉(宜蘭: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 學系碩士論文,2015)。
- 陳妍融,〈原住民文學中的同志書寫——以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月津》、《山地話/珊蒂化》、《我長在打開的樹洞》為例〉(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2)。
- 劉盈君,〈巴代小說中的部落書寫與歷史敘事〉(新竹: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教師在職 進修班學位論文,2017)。
- 蔡佩含,〈社會介入·自然寫作·歷史敘事——以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為考察對象(1970~)〉(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 盧美辰、〈「族群意識」的建構與轉折:以巴代、達德拉凡・伊苞、里慕伊・阿紀作品為例〉(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 蘇怡禎,〈對位大航海:朱和之《逐鹿之海:一六六一臺灣之戰》、巴代《白鹿之愛》與 Joyce Bergvelt's Lord of Formosa 的跨種族戰爭書寫比較〉(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報章雜誌

- 巴代, 〈史料、口傳故事的改寫創作〉, 《文訊》320期(2012.06), 頁 100-103。
- 巴代演講,顏訥紀錄整理,〈文學作品的史料、巫覡與愛情〉,《文訊》335 期 (2013.09),頁 133-139。
- 巴代、陳芷凡、〈文學、作為一種復返的路徑〉、《印刻文學生活誌》227號(2022.07)、 頁 42-59。

電子媒體

陳伯軒,〈霧漸漸散去的時候:讀巴代《月津》〉,2021.01.30(來源:「作家生活誌」, https://showwe.tw/blog/article.aspx?a=30292,2023.03.26 瀏覽)。